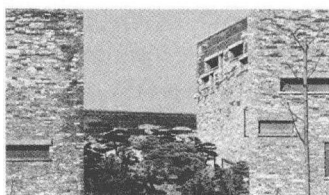


摘要：“半工业化”不仅是社会在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生产性特征，还是实践意义上的建筑学的一种内在实质。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在对王澍和朱竞翔的建筑的的分析中，重点揭示了这一状况和实质赋予建构学的可能及其提出的挑战。指出作为一种外部条件，“半工业化”鼓励和邀请了多重身体的置入与存留，作为建筑学的一种内在实质，它也使以材料和建造为核心的建构与广义的地形学不可分离。在今天中国的具体情况下，这种身体与地形要素的介入，则可能促使长期以来聚焦于本体与再现问题而相对孤立自足的建构学，更能接续“地气”，进入“世界”。

关键词：半工业化、身体、地形、建构、王澍、朱竞翔



身体的置入与存留—— 半工业化条件下建构学的 可能与挑战

史永高

The Imbedding and Prolonging of Body in Architecture :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Half- Industrialization Conditions Bring About to Tectonics*

Shi Yonggao

作为一种物质性实践活动，建筑的发展与转折中生产和制造方式的变化一直便是最为核心的影响因素。现代建筑的诞生与发展的约两百年历史中，工业化亦被视作三个主要推动力之一^[1]。自上一世纪开始长期的工业化进程中，中国的建筑实践同时承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既有生产方式的转变，又有文化传统的延承；既有功能内容的变更，又有生活习惯的固守；既有宏观层面民族身份的投射，又有微观层面个人立场的解读；既无法割舍对于农耕文明生活意趣的向往，又不得不面对能源考量下物理舒适度的欲求……

当代的中国建筑师，便无不处在这复杂的图景下，小心翼翼抑或折冲奔突，作出自己的应答。王澍把自己置于几乎所有上述矛盾的交点，专注、连续、坚定，他的实践既对于实质问题的答案探索，同时也不乏会落入象征性的姿态呈现。

Abstract: Half-industrialization characterizes the production system of a society at certain development stage, it also reflects the inner essence of architecture when examining from the practice perspective. With such an understanding, architecture of Wang Shu and Zhu Jingxiang are studied to reveal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is condition may bring about to tectonics. It's argued that as a external circumstance, such a condition encourages and invites the imbedding of body and prolongs its core status in architecture, while as an inner essence, it draws the material/ construction-centered tectonics back to topography. They may thus work together to help reconnecting the isolated tectonics, which has long been preoccupied with the dichotomy of ontology and representation, with the earthen pneumas, and bringing it back to the living world of human practice.

Key words: half-industrialization, body, topography, tectonics, Wang Shu, Zhu Jingxiang

但总是固执地要生长于或实存或想象的文化传统，立基于材料与工艺的物质现状。于是，一种“粗糙”的半工业化状态，恰恰也孕育着某种独特的机会，并因为其他多重因素的介入，而使建造本身更为丰满。

一、何为“半工业化”状况

20世纪5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积聚了近三十年的发展之后，中国的沿海城市已经基本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工业化生产体系，甚至数字化制造也已开始在建筑工业中应用。但即便如此，在其他地区以及绝大部分的城乡结合部和都市以外的乡村，情况却远非如此。可以认为，在今天的中国，生产方式上所呈现出的极端多样性，是眼下中国建筑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

面向这一具体状况，所谓“半工业化”，指的便是目前相对丰沛却又低技的人力资源 and 快

速发展的工业化施工制造体系相共存与混合的状态。观视今天中国的建筑生产状况,手工业并未因工业化的快速进行便销声匿迹,相反,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投身建筑业这一现象恰恰表明,这种“半工业化”状态将会长期存在。这一方面是人口和劳动力因素使然,同时也由建筑生产与纺织、汽车等产品生产的相异特性所决定。以“半”前缀“工业化”后,这一概念一方面涵盖了当前从“低技策略”的应对性特征到“精致化建造”的品质性诉求,从手工生产中的丰富差异性到“标准化”和“装配化”中的可控精确性;另一方面它还暗示了这一生产中的身体性操作,使建筑中有着身体性的存留,而不会完全地异化于人。如果说前者是中国当下及今后一段时期的特征和潜力所在,那么后者则是我们传统文化和建造观念中价值取向的体现,它们共同喻示了内含于这种广阔而复杂地带的多种建构可能。

虽然“半工业化”首先指向的是一种外部条件,但同时它也是实践意义上的建筑学所具有的一种内在性实质。作为外部状况和条件而言,半工业化有两种含义:一是就其生产和建造方式而言,标准化、预制/组装化、体系化的工业

再现性,并且在利用当下工业化生产所提供的机会时,“使得建筑再现的达成既不独立于技术,又不屈服于技术至上的淫威。”^[2]王澍显然也注意到这一状况带来的危险和挑战,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去接受被莱瑟巴罗视作前提的工业化条件,相反,他看重的是身边的现状所能够提供的可能。这一现状即是这里所谓的“半工业化”。

在许多场合,王澍强调他的建筑是“湿的”,不是“干的”,是“会呼吸的”,是“会长毛的”。“会呼吸”意味着他的建筑拥有与自然相连动的生命,“会长毛”则表明他的建筑欢迎气候、使用、时间对其施加的影响。而“干”“湿”之分,固然可以认为是干、湿两种作业方式,但也更意味着建筑丰满与否的区别。

这样的建筑不仅意味着建造过程中身体的介入,更意味着它根本上就是为身体的存留而建。手的痕迹至关重要。在关于上海顶层画廊的钢板把手的叙述中,他传神地描述当时现场的状况,并说自己或许不知道设计从哪里开始,但他知道,设计应该在哪里结束。手的动作以及它在物件上留下的痕迹当是作出这种判断的一个重要依据。而关于海宁陈默艺术工作室中像是洒了水的青石地板一段的叙述,描述的分明是时间与自然力下材料物质性的丰润呈现,王澍迷恋于此^[3]。这种态度当然延续到他后来的象山校园以及宁波博物馆。只是在与此前有着巨大差异的规模和尺度上,介入的策略

化方式与手工操作并存;二是就其材料的选用而言,工业化的合成材料和自然的原生材料混用。而之所以说它也反映了建筑学的某种内在实质,乃是因为即便最为纯粹的工业化制造体系,其最充分的成果也就是一个容器的塑造,而作为建筑,这个容器必须要被置于大地。如何放置,如何建立与大地的联系和关系,已然涉及半工业化中的人力和身体问题。不论作为外部的条件还是内在的实质,它在今天的中国都尤有发芽的土壤和探讨的必要。

二、“半工业化”状况下身体与地形的介入

与工业化过程相伴随的是机器的主导性地位的建立以及对于身体性的排斥。预制化和组装化的生产特征,带来的是制作的去场所化。伴生标准化和精确化的是对即时性和偶然性的排除。合成材料的使用,尤其是塑料和橡胶产品的使用,导致的是时间和生活的不留痕迹,或是留下令人难堪的痕迹。

戴维·莱瑟巴罗注意到这一现象,在其《表面建筑》一书中曾经深入地讨论过这一问题,探寻在工业化体系下,还如何能够保有建筑的

也有了相应的调整。与工艺性的手工相比,此时更为重要的,是施工现场的应对性工作为图纸上的理想设计所作的反馈与贡献。他以内在于自发建造中的品质和可能,质疑了“专业”设计与建造之间的现代关系。而对于物性的关注,更是在项目和场所的具体条件下变成了材料的再利用,它并因“材料循环”之名而被赋予了多重涵义。这一策略,一方面从能量角度为物性的理解增添了可持续性的向度,更重要的是,这种“循环”还蕴涵了历史与时间的观念,新与旧的观念,因为,正如王澍所言,房子立起之时,已纳入了上百年的历史。而这上百年的历史,不仅仅是材料自身的物质性历程,更有其中暗示出的对于过往生活的承载。

王澍这种对于操作和物性的关注,固然与其对文人传统的迷恋不无关系,但是更为令人信赖的,这是对于当下建造状况的积极响应,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发现独特的潜能。与他那些非常个人化的对于中国传统意向的解读相比,这是一种具有更为坚实基础的态度。而这种直面现实,一方面使得在建造过程中有了更多身体性的参与,同时,得益于自然材料的使用,建成建筑也与身体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因为在时间的绵延中,自然材料的变化留下了身体的痕迹,并成为对于气候条件的记录。建筑与时间一起成长。

但是这些也并非没有危险与挑战。钟情于工匠们的现场应变,对偶然性的希冀,可以理解

为对自发建造中野性力量的珍视,从更深的层面来看,还是对于现代科学和现代工业去魅化努力的一种反动。然而在现有人力资源下,它也有可能嬗变为对手工的浪漫化想象,因为建造过程中对设计的肆意更改与那种创造性变化和应对,毕竟有着严格的区别。要使每一次偶然性的出现都成为积极的贡献,需要建筑师和建造方的重新一体化,而这在规模稍大的项目中是难以想象的。规模同样还带来工艺上的挑战,因为虽然在施工方式中仍然保留大量的手工方式,在质量上却已难令人满意,现实中的建筑工人早已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工匠,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显然已经超出建筑学而步入经济与社会组织的范畴。

同样具有挑战的是对于材料的循环使用,拆下的材料(瓦片)固然承载着生活的记忆,但是在与周遭环境现状的割裂中,朝向历史的转向所给予人的可能只是一种难有依凭的想象。此时,历史与时间将止步于一种象征性的姿态,而这正是在那具体环境中宁波博物馆面临的困局:在一片历史已被残酷抹去的土地上,面向当下,将只见周围的苍白;面向历史,则可能使自己只是成

里,建筑师不仅去除了文化上的联想,甚至连建筑自身的表现和表情也被有意压制。这一方面是条件的苛刻所使然,但也难免不是建筑师的自我约束。于是,地点在这里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与历史的想象相比,可触可感知的存在于周围的具体信息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其所处的位置——这些实践到目前为止大多地处相对偏远的乡村地区,使得这一策略成为可能,因为相较于城市,乡村地区仍然存在诸多可以辨识并可引用的环境信息。

在这里,地形的巨大力量几乎消解了工业化产品的异质性,而乡民的参与更是强化了认同感的建立,二者的共同作用,使得这些容器虽然是外来品,却不会脱离周遭的环境,并且它不需你去联想,因为真实而具体的联系已被建立。这一态度不把地域性风土浪漫化,也不把乡村生活浪漫化。它承认乡村生活的当代变迁,因而便不以当代生活理应享有的舒适性为代价来表现那种静止的地域性,而是以一种适当积极的主动生态策略来优化那种纯粹的被动生态下的热工性能。这是一种不因文化责任而后视,倒因现实生活而前瞻的态度。问题在于,这样一种约减的方式,难道不会使其丧失多重的意义与厚度吗?尤其是,当脱离丰厚的乡村环境,面对更为复杂也更为捉摸不定的城市环境时,它如何避免自己的苍白呢?

王澍对于物料和建造几乎天生便有心得,

为一道孤独的布景。构筑这片历史布景的正是那被循环利用的材料。当然,这一层瓦片还参与了墙体的保温,但是如果考虑到为此而采用的整片混凝土墙所带来的耗费,恐怕将很难说“循环的诗意”^[4],或者说循环的仅仅是“诗意”了。这正凸显了在这种材料循环中,包括物理性能在内的总体设计所带来的挑战。

如果说这些问题在王澍那里是潜在的或现实的危险与挑战的话,晚于王澍半代的建筑师朱竟翔,似乎在他近年的实践中在着意去加以规避。

在四川、云南那些相对苛刻的条件下,建筑师应用了自己此前研发的“新芽”轻钢框架木基板材复合系统,把可以异地工业生产的和必须要现场人力制作的进行了相对严格的区分,从而得以统合异地的技术资源和本地的人力资源。前者保证性能上的可靠性,解决建筑作为容器的问题,后者则常常通过对具体地形的回应来实现建筑的在地化,解决这一容器如何接触大地的问题。限制条件的具体化,一方面使其可以专注于优化这一建造体系,同时又可根据现场条件,物尽其用,基本实现建造过程中的物料循环^[5]。在这

朱竟翔也早在他第一个独立完成的作品盐城市青少年宫中已经探讨结构对于空间的贡献。他们对于建构问题既敏锐,而又警觉,可以说是最先一批对于建构问题有着理论自觉的建筑师。他们都立足当下的状况,但回应以自己特别的方式,走上差异化的道路。

三、重新思考我们的建构方式

在当代中国,建构学历经15年左右的发展,与现代建筑中的空间主题一道,已经实质性地推进了中国现当代建筑实践与教育。但同时,在以风格化为直接标靶的话语中,“建构”也已经在事实上被窄化为“对结构关系与建造逻辑的忠实表达”的僵化认识,进而被约减为“结构—表皮”的二元对立。这样的“建构”在把建筑带回物质性主题的同时,也难免让人忧虑它到底还能为我们进一步的实践提供多少养分。更具体而言,当前国内学界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有西方建构理论话语的引进与解读,以及对中国营造传统之价值的认识,但是其在本土和当代条件下的转译方式,可能呈现什么样的理论样态,仍有待回答;有对于身体与地形的理论探讨,但是如何结合中国传统建筑中根深蒂固的人本价值和自然观,贡献于当代中国的建构学,仍有待理论的探索和实践的检验;有本土状况下的实验与探索,但这种基于本土现实境况的实践,与西方建构学之间的差异背后的原因,所激发

的多样化可能及其理论表述,尚待进一步阐明。

虽然关于建构学的探讨存在诸多不足,但毋庸置疑的是,当下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建筑实践仍旧需要建构的核心思想来支撑。这种状况迫使我们要找到一条不同于以往和现在的道路,基于本土境况去重构一种差异但更为丰满的建构学。如果说“身体”意味着建造活动的终极指向与依归,“地形”则是建造活动的首要前提并决定着建筑的存在状态,二者把建构带入人与环境的鲜活世界,而“半工业化”的状况则为它们的介入提供了物质性前提。就这点而言,王澍和朱竞翔近年来的实践,虽然表面看来有着巨大差异,但无疑都从不同的角度,做了非常富有启发性的工作。

之所以说是启发性的工作,因为其中反映出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仍然有待探讨:以两大特征——相对丰沛的人力资源和快速发展的工业化施工制造体系——的同时存在和混合为表征的当代中国“半工业化”建筑生产体系,是现代建筑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独特现象,它究竟可能发展出什么样的差异化建构学理论和策略?以“本体”与“再现”之关系为核心关注的西

一并不完美的现实条件提供的是一条罅隙,让身体与地形得以进入,让长期以来聚焦于本体与再现问题而相对孤立自足的建构学,更能接续“地气”,进入生活世界。当然,“半工业化”中涌现的工艺低下、环境割裂等问题往往已经超出建筑学的范畴,但是如果在接下来的十至十五年间,能够仔细地推进一种在地化的城镇化发展方式^[7],将有可能使人口不必大量游牧,并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维护甚或复兴一些地域性的工艺传统,使得机器的准确与人工的灵韵齐头并进,相得益彰。在另一层面,城镇化的发展也暗示了一种重建人地关系的机会,使建筑和人的身体,和具体的地点,和生活与世界有着更多的交集。

果若如此,将可能涌现一些既不同于成熟的工业化体系下,又因为地区生活、历史习惯以及具体的物质状况,而与他处的前工业化体系呈现差别化发展的建筑。

(作者:史永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客座副教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面向身体与地形:中国半工业化条件下建构学理论及其本土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51278109)]

方建构理论话语和以“人本”与“自然”为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营造观念,是否可以融合,是否可以共同化为基于中国当代条件的建构学理论的观念基础和思想资源?那种基于农业社会生活样态和生产方式的人本价值和自然观,如何可以应对当代逐渐走向工业化的城市现实?而当代有关“身体”与“地形”的理论探讨,又是否可以在这种应对中起到某种桥梁的作用,既丰富近15年来对西方现代建构学转译中产生的简化理解,又贡献于当代和未来中国的建构学理论与实践?

结语

作为一种外部条件,建筑业中的半工业化将长期存在。而在中国这么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地区差异巨大的国家,这一问题尤有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假如我们一定要以基于先发展工业化国家的建筑生产体系的建筑为榜样,则自然会呼吁精致化的设计与施工^[6],但建筑永远都是在特定的而非理想的条件下去解决问题,因此立足当下的现实,探寻其中的潜力至为关键。“半工业化”这

注释

[1] Kenneth Frampton, *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92). 见第3章。

[2] David Leatherbarrow and Mohsen Mostafavi, *Surface Architectu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c2002). P6. 对于工业化带来影响的更广泛的讨论尤其见于其中第5、6两章。

[3] 关于顶层画廊和海宁陈默艺术工作室,参见王澍.设计的开始.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

[4] 王澍,陆文宇.循环建造的诗意:建造一个与自然相似的世界.时代建筑,2012(02):68-69.

[5] 朱竞翔.新芽学校的诞生.时代建筑,2011(02):46-53.

[6] 秦佑国.中国建筑呼唤精致性设计.建筑学报,2003(01):20-21.当然,更多有志于诞生好作品的建筑师们对此更是心向往之,不能达此目标时便万分失望,抱怨周围环境,而少有细心发现现实状况中的潜力。

[7] 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指出“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这把改变城乡二元化,推进城镇化,纳入了实现现代化国家的部署,同时把城镇化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这有可能转变之前疾风暴雨式的城市化建设和单线发展型的城镇化道路,从社会结构和产业经济等不同的宏观层面为解决本文提出的一些问题提供空间。